

以臺灣發展經驗

評估中國大陸之經濟現代化

李國鼎

第八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舉行揭幕典禮，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博士應邀在會中發表專題演講，深受各方重視。本文即其演詞之中文譯本——編者。

今天本人有機會在諸位專家學者面前講話，深感榮幸。此次會議選定「中國：持續與改變」為研討主題，不但恰當，而且合乎時宜；因為自從毛澤東死後，主張持續與主張改變者之間的政治和經濟緊張，日見升高。最近各方所報導的五名政治局委員的停職、上海的遊行示威、以及對外訂購合約的突然凍結，都足以說明此點。因此，我今天來和諸位討論中國大陸在其「現代化」之追求中所面臨的經濟挑戰與衝突，或許是適宜的。

經濟挑戰與緊張是任何現代化過程固有的一部份。中華民國曾經遭遇過此種挑戰，但已成功地加以對付。就中國大陸而言，這種考驗則剛開始，這倒並不是因為中共政權以前從未要求過經濟現代化。實際上，在過去三十年之中，它曾經數度企圖使經濟現代化：首先是借重蘇俄的援助，其次是採取「大躍進」政策，再次便是搞「文化大革命」，但所有這些企圖都失敗了。至於目前的「現代化」計劃，其新奇之處乃是中共採取了中華民國式的外向發展策略。在許多方面，中共的這一計劃都類似中華民國的發展模式。重要的問題是：此一在臺灣行之有成的發展策略，會不會也在中國大陸奏效呢？本人願就中國大陸動員、發展，以及有效運用經濟現代化三要素——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的能力，來研討此一問題。

資本形成問題

中國大陸所訂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年的發展計劃，要求農業生產的年成長率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工業生產的年成長率百分之十以上^①。如果和臺灣的成就相較，這些目標定得並不太高。臺灣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七年期間的農業及工業生產平均成長

註①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

率業已超過上述水準^②。不過，就中國大陸過去的表現而言，這些目標難免有點野心勃勃，因為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七年的期間，中國大陸的農業生產每年僅會增長百分之二，工業生產每年成長百分之十^③。爲了達到這些目標必需要有一個龐大的投資方案。根據日本方面的消息，中共的十年發展計劃需要六千億美元的資金^④。這對一個平均每人所得只有四百美元的國家來說^⑤，實在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目。因此，我們禁不住要問：中國大陸能够動員這樣龐大的一筆資金嗎？

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權威估計：中國大陸將會有兩千億美元的儲蓄差額^⑥。此一頗爲悲觀的估計，顯然與真實情況相距不遠，因爲中共領導階層最近已經承認他們的投資計劃過於龐大，必須加以削減^⑦。至於資金短缺的原因，也是不難找到的。第一，由於人口的繼續成長，個人消費的增加，現已形成一種強大的壓力。中國大陸在一九七八年中的總人口約爲九億，且正以百分之二的速率逐年增加^⑧。這就是說，中共每年必須另外提撥資源，以供一千八百萬人的衣、食和住。雖然，人口的成長將來可能略見和緩，但在基本上，此一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仍將使新生人口保持相當龐大的數目。這便意味着在未來十年中，人口對資源的壓力不可能比過去輕鬆。

更糟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原已相當低的大陸人民生活水準，迄今未獲改進。一九七七年的每人穀物生產量並不比二十年以前爲高^⑨，每人的棉布消費量也未增加，住宅情況的改變更是微乎其微^⑩。此種漫無止境的經濟困境、新領導階層不能兌現的改進諾言，以及中國大陸人民對其生活水準與西方國家間巨大差異的日益了解，都會在工人和農民之間引起高水準消費的期望。

增加國內儲蓄的另一主要困難，是軍事現代化所需的資源。以目前情形而言，在中國大陸渴望變成一個強權與其陳舊落後的軍事能力之間，存在着一段長遠的距離，因此，中共把「軍事現代化」列爲其四個現代化目標之一，並不足異。最近它與越南之

註② 經濟建設委員會編印之一九七七年臺灣統計手冊，一九七七、五五及七四頁；中華民國統計月報一九七八年九月號，第四卷第九期第一頁。

註③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CIA, 1978, 9.3.*

註④ 此一數目係李先念所提出，見一九七九年一月卅一日東京每日新聞第四頁。在此以前，日本通產大臣河本敏夫估計所需資本總額爲三千五百億美元，但又謂所需實際投資可能更多，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東京共同社通訊。另一估計將總額定爲二千五百億美元，見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 *Business Week* 第四八頁。資本總額較高的估計，與華國鋒所作十年期間的投資將等於過去二十八年的總額之聲明，似較符合，見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新華社」報導。

註⑤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p. 1.*

註⑥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79, p. D11.*

註⑦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2, 1979, p. 9.*

註⑧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p. 6.*

註⑨ *Ibid., p. 47;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79, p. A11.*

註⑩ Christopher Howe, *China's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173-173.

間的沒有結果的戰爭，和它跟蘇俄之間的持續不斷的戰略對抗，都會對軍事將領們擴大分享資源的要求，提供强有力的藉口。然而，現代化武器都是很昂貴的，即使是一個小規模的軍事現代化計劃，也需要大量的經費。既然人民的消費水準業已很低，任何軍事支出的增加，勢必損及資本的形成。

在過去，臺灣也曾遭遇過儲蓄差距的問題，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嚴重依賴美國的援助，其總額約為十五億美元^⑭。但自一九六二年以後，國內的儲蓄淨額顯著增加，不久便已取代外國援助而成爲資本的主要來源。在最近幾年中，外人投資雖已變得重要，但與其說這是資本的來源，毋寧說這是導入技術和獲得市場途徑。

那麼，這樣的外國援助和外人投資是否也會在中國大陸發生效果呢？可能不會，這是基於下述各種理由：

中共曾經宣佈不接受贈與或貸款，但最近它已放棄不借外債的政策，並且正在交涉自日本獲得一筆開發貸款^⑮；唯與中共所需兩千億美元的鉅大儲蓄差距相較，二十億美元的日本貸款，祇是「滄海一粟」罷了。鑑於中共政治極不穩定的歷史、過去迭次軍事侵犯和挑釁的紀錄^⑯、以及其將來還債能力的大有疑問，西方國家似乎極不可能去填補它的另一大段儲蓄差距。

然而，中共最近仍在試圖吸引外來投資，一些聯營計劃也正在談判之中。在此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吸引外人投資所具備的優良投資環境的一些基本因素，在中國大陸多付缺如。第一，和臺灣穩定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共的歷史則充滿了不斷的權力鬭爭和政治動亂。任何外國投資都必須承認毛派激進份子有捲土重來的可能以及統治階層內部權力鬭爭的爆發；一旦強硬派接替了年老的鄧小平，任何人都不能擔保中共的現行政策不會改弦易轍。第二，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明定的法律與規章，以保障投資人的財產權利，列載課稅的規定，以及保證投資人對其資本與利潤的匯出。第三，中國大陸社會的基本建設極不完備，電力供應極端短缺，運輸設施也是如此。這與臺灣的情形全不相同。最後，中國大陸雖有可觀的廉價勞力資源，但他們大都是非技術勞工，而且缺乏工作的意願，這也和臺灣迥異。如果我們把低的勞動生產力、訓練費用、以及品質管制問題併予考慮的話，則這些供應豐富非技術勞動者，可能並不是廉價的勞動力。

在沒有優良投資環境的情況下，中共欲以外人投資和外國貸款來填補其儲蓄差距的遠景，是很黯淡的。正因如此，中共對於另一重大問題——潛在的外匯差距，亦將難以應付。

註⑭ 一九七七年臺灣統計手冊，第二一八頁。

註⑮ *Economist*, March 24, 1979, p. 106.

註⑯ 例如一九五二——五三年的韓戰；一九五四及一九五八年的臺海戰事；一九六一年與印度的邊境戰爭；一九六九年與蘇俄的邊境衝突；一九七二年與越南的沙羣島衝突；一九七九年的侵越戰爭。

一一 外匯差距

目前中國大陸發展策略的關鍵在於推展外銷。由於其外匯存底頗為有限（一九七七年底約為四十億美元）^⑭，所以必須快速地拓展外銷，俾便支付外國技術、穀類、以及軍事裝備的大量輸入。然而，在今後十年之內，快速的外銷拓展能否支持輸入的增加呢？西方觀察家一致的看法，是否定的，但他們對中共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期間潛在貿易差額的估計，為一百五十億至五百億美元^⑮，相去甚遠。如果我們同意美國商務部所作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折衷估計（假定輸出年成長率為百分之十二點五）^⑯，此一逆差數字仍然十分龐大。

奇怪的是，中共領導階層最初對於此種問題似乎全不關心，且反而向外大肆搜購^⑰。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忙於談判價值四百億美元的設備和技術輸入，並曾簽訂七十億美元的合約^⑱。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另一價值四十九億美元的輸入合約，亦經簽訂完成^⑲。不過，中共的信心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到了二月下旬，它便突然中止所有各項談判，表面上是以重估其發展計劃為詞，但中共官員稍後承認是由於財政困難^⑳。其後，中共曾與幾家日本及西德銀行商定為數可觀的貿易融資，顯然是預料會有頗大的貿易逆差^㉑。

同時，中共也曾採取多項新的措施，期能增加其外匯供應，例如發展觀光事業，在香港附近設立半加工出口區，以及鼓勵以新廠產品抵償外來投資的補償貿易。至於這些措施連同國外借款能否解決中國大陸的貿易差額問題，誰也沒有把握，尤以就西方銀行的借貸意願而言，更屬如此。不過，我們不難察覺：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經驗互相對照之下，中共拓展外銷的努力會有許多基本上的困難。

註⑭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共計二十一億五千萬美元，黃金存量約值二十億美元，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第十五頁。

註⑮ 低估計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作，見*China: Post-Mao Search for Civilian Industrial Technology*，一九七九，第十頁。高估計為Bank of America所作，其數額在二百五十億至五百億美元之間，見*Business Week*，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第十八頁。

註⑯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rospects for PRC Hard Currency Trade Through 1985*, 1979.

註⑰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華爾街日報」第六頁所載鄧小平談話舉例。

註⑱ *China: Post-Mao.....*, p. iii.

註⑲ 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華爾街日報」。

註⑳ 中共「副總理」谷牧解釋說：貿易談判之中止係由於沒有充分之財政支持所促成。見東京共同社通訊，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㉑ *Economists*, March 24, 1979, p. 106, April 7, 1979, p. 112;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6, 1979, p. 108.

偶一檢視中國大陸出口貨品的組成情形，便可看出有兩大類產品在其外銷貨品名單上，最為突出：第一類是與農業及輸入原料有關的產品（如食品、紡織品、衣着、鞋類以及一些原材料），約占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二，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大多是「敏感貨品」；第二類是能源資源（主要為石油），約占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十四^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的輸出潛能必須嚴重地依賴這兩類產品的增產能力。在某一方面，臺灣早期發展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也曾遇到過大量依賴農產品外銷的同樣問題。但是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重要區別是，臺灣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六年的期間，其農業生產係以百分之四的平均成長率逐年增加^③，這與中國大陸同期成長率百分之二相較，高出一倍^④。中國大陸要想提高其成長率，自須作出極大的努力^⑤，大多數西方觀察家相信，百分之三的成长是可能的^⑥；但此一估計也可能過於樂觀，因為自北平新政權於一九七六年登場以後的兩年期間，中國大陸的農業生產每年僅增加百分之一^⑦。即使百分之三的成长率是一合理的估計，但由於大陸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費期望的昇高，要可供輸出的剩餘農產品以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成长率，迅速增加，似乎是很不可能的事。

石油輸出的遠景，也不是更為光明的。無疑地，開採油源所需的龐大投資、日益增長的國內需要，以及大量的石油含蠟成分，都會限制其出口潛能。根據倫敦「經濟家」雜誌最合理的假定，中國大陸石油輸出的增加率不會超過其石油生產的成长率。許多專家相信到一九八五年時其石油生產增加率將為百分之十左右^⑧，但仍比此一時期所需整個出口成長率百分之十二點五為低。另有兩項因素可能進一步削弱中國大陸的出口衝力。第一、中國大陸必須支出可觀數額的外匯，藉以輸入年約一千萬噸的穀物，至少在未來數年中仍將如此^⑨；同時中共對於軍事技術的輸入，亦已表現出強烈的興趣^⑩。因此，穀物和軍事裝備的輸入，可能會吞食中國大陸在未來數年內輸出所得的三分之一^⑪；而更重要的是，在這兩項貨品之中，沒有任何一項是有助於出品能力的增長的。

註^②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1977-1978*, CIA, 1978, p. 14.

註^③ 一九七七年臺灣統計手冊，第五五頁。

註^④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p. 1.

註^⑤ 根據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東京共同社報導，某中共官員承認：「僅祇農業現代化的準備工作，就要費數年的時間。」

註^⑥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 No. 3, (Fall 1978), p. 115.

註^⑦ *China: Economic Indicators*, p. 1.

註^⑧ *Economist*, March 3, 1979, p. 100.

註^⑨ *China: Demand for Foreign Grain*, CIA, 1979, p. 1.

註^⑩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79, p. A5; AFP, Hong Kong, September 8, 1978.

註^⑪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第十五頁。

第二、臺灣拓展出口的成功之鑰，在於能夠不斷的更新其工業及外銷產品，藉以適應經常變動的國際市場需要。臺灣把一九五〇年代的主要外銷產品——糖和米，轉換為一九六〇年代的紡織品和農產加工品以及一九七〇年代的電子和機械產品，便是顯明的例證。要保持這樣的彈性和動力，便必須要有企業家和有高度進取心的技術勞工，但在中國大陸上，兩者均付缺如，因而使我們聯想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問題——人力資源。

三 人力資源的運用與開發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是一個富有動力的國家，這樣才能吸收和運用新的生產技術，並能針對變動不居的市場情況，從事自我調整。此種動力的推進力量，主要是工人、農民、技術人員和經理人才，他們常以高度進取心的作為，去生產、創新和發掘經濟機會；而產生此種推進力量，其問題是兩方面的，一是工作誘因，一是人力投資。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係以強調提高消費水準和教育的重要性來處理上述的問題，並且讓盡力工作和勤於創業的人們，在自由企業制度之下，獲得應有的報酬。但在同時，政府也透過財政政策和其他措施如反貧窮方案以及農產品與公用事業定價等，採取行動，以減少所得分配的不均現象。結果，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六年期間，臺灣每人的真實消費每年增加百分之四以上^②，而量度所得分配不均的各種指數，在過去二十年內，却已顯著降低^③。在教育方面，由政府經費支持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已使中等學校男生的入學率，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八，增至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共僅以提高生活水準作為一項諾言。物質獎勵不但已被降低，且已為意識形態的動機所取代；個人的所得和消費已被保持在很低的水準上；工人、農民、技術人員和經理階層的報酬，不是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是基於他們對馬克斯和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奉獻。大陸人民的所得分配政策是根據所謂的「平等主義」，但實際上是把分配降低，而不是像臺灣一樣把分配提高。因此，中國大陸的生產力一直陷於停滯狀態，達數十年之久。中共政權的一名官員曾經公開承認：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每一工人的工業生產量，未曾有所改變，農業方面的生產情形，也是一樣^④。

至於技術人力的供應情況，甚至更壞。中國大陸現正嚐到了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苦果，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經完全破壞了教育

註② 一九七七年臺灣統計手冊，第四及第三五頁。

註③ 吳元黎著，"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Taiwan",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Occasional Papers,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o. 3, 1978, pp. 67-112.*

註④ 胡喬木，「按經濟規律辦事，加速四個現代化」，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光明日報」第二頁。

制度，阻礙了研究發展的努力，並且使中國大陸孤立於世界技術發展之外。因此，在過去十年之間，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任何人力資源的投資。據中共自己的估計，現在約有四十萬受過技術訓練的人員，但是此一數目遠比現代化計劃所需要的八十萬爲少。所以，即令中國大陸在輸入現代技術上沒有任何融資的困難，其有限的吸收能力，仍然是一個問題。它可能沒有足夠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勞工，去有效運用那些來自國外的高深而精密的技術。

至於經理階層方面，我們只須引述中共官員的話，便可窺見一般。該官員說「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是中級管理階層的觀望與無知」^⑤。

也許中共政權明白了他們政策的錯誤，所以最近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一九七七年十月，約有半數勞工的工資已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農村集市已予重新開放；高等教育的入學考試已經恢復舉行；並且選派學生前往外國受訓。這些改革措施的效果如何，尙難預料。不過，這些着重技術和物質獎勵的現行趨勢，可能在整個制度中產生兩種潛在的衝突。第一是人民的個別利益與國家的集體利益之間的無可避免的衝突，例如存在於鄉村裏的三萬個自由市場，無疑會把農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熱誠，摧毀殆盡^⑥。

第二點更爲重要，那就是中共上層領導人物之間會爲了不同的政策而產生潛在的政治衝突；同時另有一批現正獲得較多權力的科技人員以及在毛澤東和四人幫之下獲得升遷的強硬派幹部，他們彼此之間，也可能由於同一原因而發生同樣的衝突。此外，中國大陸的教育目前也在逐漸着重現代化計劃，這會對具有城市文化背景的青年，比對出身鄉村的青年，提供更多的機會，從而使城市和鄉村人口之間的關係，更趨緊張。由於在共產制度之下，這些衝突無法經由法律途徑，獲得疏解，所以終會在權力鬥爭中表現出來。

結 語

現在讓我把剛才所說的幾個要點，加以概述。經濟的現實使中國大陸的現代化計劃，遭遇着嚴重的障礙。中國大陸現正面臨着一個儲蓄的差距，一個外匯的差距，和一個技術的差距。它在人力資源的開發和運用方面，也面臨着嚴重的問題。這些困難，一部份是由於迭次權力鬭爭以及各種運動和整肅的不穩定的影響，一部份是由於設計的錯誤和經濟管理的缺失。但這些困難的最後根源則必須求之於制度的本身。在基本上，填補上述各種差距所必需的社會價值、機構和政策，都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

註⑤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東京讀賣新聞。

註⑥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1, 1979, p. 1.

互不相容。在一個服膺馬克斯理想且由共黨法令控制和管理的極權政治制度之下，一個富有活力與動力的經濟所需具備的各種要素，毫無存在的餘地。在這些要素之中，應包括一個穩固而有效的法律架構，個人的工作誘因，以及企業精神。對個人的經濟福祉給予較高的優先，便是降低資本累積和軍事現代化的集體利益；對較有才能的人強調報酬，便和平等主義的傳統理論互相矛盾；對市場機能的信賴，便將破壞共黨領導階層的決策權力。借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目前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本質，是一個基本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權現正面臨一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它採取那些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行之有成的實用主義措施，則將導致某些資本主義因素的復活，從而腐蝕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且終將動搖其政治制度；如果它堅持共產主義的教條，則其經濟現代化計劃，便將很少有成功的機會。現在，中共正向實用主義靠攏；但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經濟現實之間，再度爆發一場持久的鬭爭，從而帶來另一回合的政治和社會動亂，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芸汀譯）。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爲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中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六〇〇元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八〇〇元
美金 十五元		美金 二〇〇元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內 新台幣 十二元
美金 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